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9年散文：

纸上的亮点与记忆的暖色

□李林荣

一

2019年的中国文坛，回荡着“大事多、喜事多”的主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新中国70年的建设历程，成为各体文学创作在选材和立意上共同聚焦的热点。在这一大背景下，散文创作的总体表现较之小说，仍如往年一样，平稳沉静有余，昂扬火爆不足。这种从宏观创作态势的横向比较中得来的印象，更多的反映在体裁特性的边际差别和相对动向，而非创作实绩起落消长的确切表征。

与追求视野宏阔、格调高亢的史诗叙事和社会风俗画气派的小说不同，散文自白话新文学奠基之际，就确立了以“个人的发现”为观照视角和精神立足点的低调品质。待到新时期文学复兴，经巴金《随想录》等重要作家作品和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等创作潮流的持续推动，作为现代散文文体灵魂的“个人的发现”，又获得了来自当代社会情境的激发和滋养，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延展。一个与社会现实关联得更加紧密，在思想上感情的世界里也表现得更具活力的“个人”，从日益多见的散文新作里挺立起来。及至近年，伴随“非虚构”等新文类的蓬勃崛起，无论是读者对散文的接受心理，还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价值期许，都已明显溢出理想中的纯文学范畴，指向了以介入社会现实为旨归的文学形态蜕变和文学功能重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个人的发现”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会现实深处。

对此，新世纪以来，散文写作领域蔚然成风且愈演愈烈的做法，是背离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一味往外走，耽于扩大选材的社会覆盖面，而疏于强化自我认知的深度和精准度。遍观2019年各地文学期刊上新载的散文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似乎是物极必反的“向后撤”和“向内转”的迹象。彭程的《家住百万庄》（《人民文学》2019年第7期）、韩小蕙的《协和大院》（《美文》2019年全年连载）、杨炼的《北京—柏林：时空之间》（《花城》2019年第3期）、沈芸的《南竹竿胡同113号》（《花城》2019年第4期）、以及下文将另做论列的一批佳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鲜明地证实，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问世之后，长期高和寡、流于高冷的深描亲情纠结和生命痛感的题材又开始重新升温。在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之后，一度被仿写泛滥成灾地步的描摹“我”昔日栖居处的题材，也再度焕发了神采。

这不只是把作者个人生活经验重新拉回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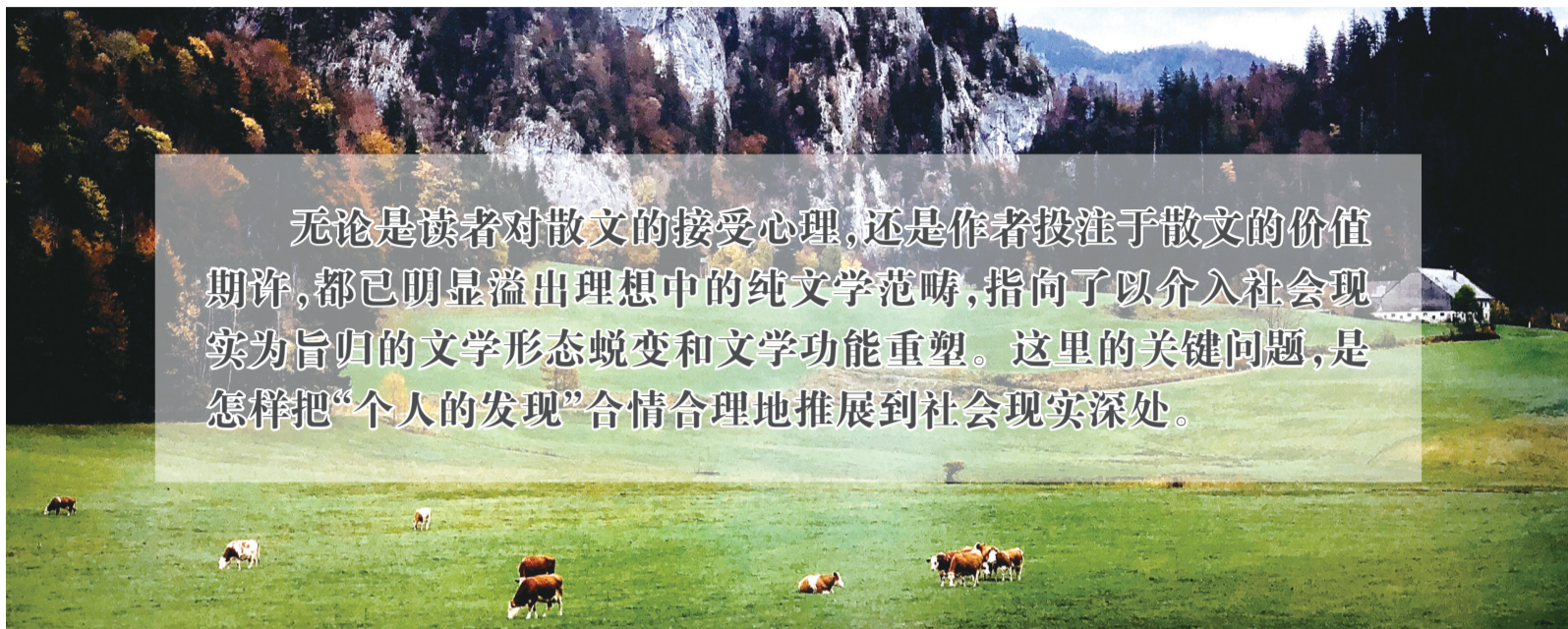
文创作前台的一步技术性或者操作性的反叛，更是散文文体精神的一次回炉再造。在貌似后撤和内转的创作姿态中，一个对自我精神生命的出处和自身所在的大时代的认知和感受能力更强的主体，实际上已经显现了出来。

二

2019年的散文新作中，读来最动人的作品都属讲述作者父亲或母亲生平的类型。万方的《你和我》（《收获》2019年第4期）、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十月》2019年第4期）、孙郁的《劳我一生》（《随笔》2019年第4期）、陈村的《我的母亲》（《上海文学》2019年第2期）、海男的《论母亲》（《散文》2019年第3期）、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美文》2019年第11期）、于坚的《父亲记》（《钟山》2019年第3期）、程绍国的《父亲是程颢的后代》（《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类散文创作里的熟题和老题，向来易写难工，更确切地说，写到只感动自己的程度容易，写到既能感动自己又能感动他人的程度很难。个中要领，不在局部修辞技巧如何妥帖精妙，而在作品整体语态的设置：是纯粹的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还是独白与告白、自语和对话的交互穿插。对散文来说，告白读者或与人对话的语态设定，既有引发和维持读者代入感的作用，也有节制、冲淡作者自我宣泄的作用。这两重作用匹配得当，整个作品才有可能聚集起对己对人都饱含感染力的精神能量。《你和我》中赫赫有名的父亲曹禹与隐身在家族和丈夫的盛名之下的母亲方瑞，《与你遥遥相望》中一生平凡也一生纠结、文青气质时时溢于言表的母亲，《劳我一生》中蒙冤含耻以至在子女成长记忆中几乎退缩为一抹虚影的父亲，随着作者丝丝缕缕娓娓道来的忆述，都能显露出各自生气淋漓的人格光彩和独特个性，对叙述语态的恰当安排和与之相关的创作心态的精细调适，当为首因。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追述作者生命记忆中极短促也极宝贵的母子亲缘的《母亲与我的十二年》，在深情缅怀和开展苦涩的公私道德辩诘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为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的养父立传寻根的《父亲是程颢的后代》。以上这些作品中的父母亲们，本身的际遇和性格都各有与众不同之处。依世情常理，子女对于他们的铭记、思念和回忆中，相应地也该有不足为外



无论是读者对散文的接受心理，还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价值期许，都已明显溢出理想中的纯文学范畴，指向了以介入社会现实为旨归的文学形态蜕变和文学功能重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个人的发现”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会现实深处。

人道的一部分特殊内容。这样的内容，是否适宜转化为文学创作题材？如果适宜，在进行这种转化时，它们究竟是一笔原封不动就可以保值甚至增值的财富，还是非得经过提炼打磨才能散发散热的原料和资源？

也许是偶然碰巧，也许是水到渠成，2019年的散文中悄悄亮相的这批在写父母、述亲情的旧题和熟题上绽放高光的厚重之作，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回答。详察文本不难发现，洋溢在这些作品中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情思冲击力，都不是从直接交代素材和叙述实况的语句片段里升腾起来的，而是从叙述者“我”对父亲或母亲的日常言行、人生遭遇和精神状态，试图做出最可靠、最精准、最权威的阐释、分析和评价的那种倔强语流里迸发出来的。在一过程中，读者不但没有被排斥在场外，反而始终被当作倾听作者诉说

的第一对象。换句话说，这类散文在文体生成的起点上，就是面向读者和关联读者的。完成整个作品的过程，就是作者向读者证实自己对父亲和母亲的一生不仅牢牢记得而且深深懂得的过程。因此，以往无数类似主题的散文写作中通常要反复堆砌的感恩称颂之辞，在这儿一概都被排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子女对于父母或任何打算写进作品的亲人或朋友的最大诚意、敬意，并不是语象层面的浮泛赞美，

而是题旨意蕴层面的深入理解和细致阐释。

三

散文在现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中享有自成一体的独立地位，这一点从理论上已很少有人反对。但与此同时，在写作实践中，散文又确实常年不变地承担着文学话语“副声道”的功能。小说家、诗人在小说、诗歌创作之余的创作谈，文学评论家及文学理论研究者对文坛风云和专业话题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各种赋比兴式的感受、兴观群怨式的记录和联想……一经形诸文本，不管理论界有多大争议，事实上大多归集了散文的门户。

从尊重客观事实的角度看，这不是散文界的混乱，而是散文写作的正常生态。更何况，在所谓跨界而来的各路作者所写的各类散文中，论艺术技巧和命题立意，都时有精湛深切不亚于“为散文而散文”的一流表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散文写作方式对凝聚文学行业力量有益，对于在社会文化场域内，见证和塑造文学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及现实形态也一直在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直击现场或追踪既往的散文写作，也会显露出一种文学史档案和文学史资料的珍贵价值。

阎纲的《屠岸温润亦刚强》（《北京文学》精彩

阅读版2019年第12期）、郁葱的《此去经年——北马路19号的繁花与落叶》（《长城》2019年第2期）、璐璐的《重读一禾来信》（《收获》2019年第5期）、刘雁龙的《没有形容词的三里湾》（《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蒋子龙的《碎片集》（《长城》2019年第5期）、孟繁华的《他是鸿雁，他是苍鹰》（《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7期）、陆正伟的《巴金和冰心的友情》（《上海文学》2019年第10期），以及汤吉夫口述、南昌宝整理的《忆作家朋友》（《长城》2019年第1期）、都属过去一年里记述文坛人物和文坛往事的散文力作。它们记述的人、事、文本，或值得纪念和重温，或足可为当下文坛立一镜鉴。

此外，在2019年期刊所刊载的散文新作中，李修文的《小站秘史》（《十月》2019年第2期）、东君的《向阳路的游荡者》（《十月》2019年第4期）、美人六的《绿皮火车》（《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刘汀的《东北偏北》（《天涯》2019年第1期）、陈元武的《昆虫笔记》（《天涯》2019年第6期）、王族的《食为天》（《花城》2019年第2期）、《中国作家》文学版2019年第9期）、毛云尔的《放刀子的人》（《散文》2019年第1期）、蔡惟忠的《作别炮声》（《散文》2019年第2期），也闪烁出精致的架构和瓷实的内容相得益彰的异彩，证明它们的作者过去一年里花费在散文创作中的心血，绝对没有虚掷。

■第一感受

到现实中萃取精华和养分

——读《索玛花开幸福来》 □侯志明

四川作家胡正荣在3年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索玛花开幸福来》《幸福的索玛花》，体现了作家自觉投身脱贫攻坚的文学实践。小说《索玛花开幸福来》文风朴实，娓娓道来，以几乎无技巧的写作手法，完成了写作的最高技巧，这反而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作品描绘了彝乡村民复杂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作品中的村民已然不再是符号化的观念的载体，而是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同时，作品融入了独特的彝族文化元素，把人文地理景观和关切温暖的基调贯穿始终，对彝族火把节、过年、婚丧、服饰、起居等场景的描绘，呈现了彝族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摇曳多姿。

读《索玛花开幸福来》，眼前不断闪现出火热的扶贫场面，主人公胡明军有血有肉的形象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我仿佛看见了大凉山盛开的索玛花，一团团、一簇簇，那么亮丽、那么灿烂、那么红火，像彝族同胞家里升起的热火，像彝族同胞待客的坨坨肉，像彝族同胞自己酿的美酒，幸福吉祥。

《索玛花开幸福来》是一部反映对口脱贫攻坚的小说。作者能把它写得如此生动，我以为这是作者全身心投入到这一火热现实的结果。文学艺术本来就来源于现实，本来就应当记录生活，应为人民服务。人们群众安居乐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一个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索玛花开幸福来》中，作家的笔触深入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灵魂，深入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这部小说的结构和推衍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不十分简单，换句话说，就是实实在在把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写出来。

小说中的胡明军是富城区南平乡纪委副书记，一名退伍军人，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迎着国旗必行军礼，用笛子吹奏国歌，组织升旗仪式无不让人动容，用自己的行动引导人们要知恩、感恩。他放弃舒适的工作环境，主动申请前往凉山哈觉县进行

精准扶贫。到任后，他深入彝族同胞家中走访，了解村民的贫困情况，与村民打成一片。在这里，他不断寻找扶贫的项目，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立足自身实现脱贫的决心信心。同时，他积极开展扶志教育，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树立主体意识，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开展实用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本领，以典型示范、榜样力量激发贫困群众脱贫信心和斗志，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能力……军人出身的他敢说敢干，敢作敢当，雷厉风行，以自己的行动让当地政府干部感动，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胡明军经历了2008年特大地震，与教师金铃相知、相爱，两人共同抚养孤儿张杰，使之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主动前往凉山支教，谱写了一曲父子上阵齐扶贫的动人乐章。作品以扶贫为主线，充分展示了民族情、亲情、父子情、兄弟情及主人公的深厚家国情怀。

此外，小说中还有援彝的医生、教师、社会贤达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努力做着属于自己的事情，不求回报。有人说“奉献”是一句口号，但是你真真正正奉献了，奉献就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奉献他人，快乐自己。这种奉献，这种快乐，需要一颗坚定不移的初心，为了幸福的索玛花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盛开，他们不遗余力。

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生活中找到生活。《索玛花开幸福来》让人知道了平常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有温度、有高度、有含金量。但是要想获得这样的生活，必须要在生活中去寻找。《索玛花开幸福来》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生活，必须有坚定的信仰，必须在信仰的指引下不断在实干中一点点获取。援彝的同志们很有心得，被帮扶的对象很有心得。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他们舞出了幸福的索玛花。几十年前，红军从这里走过，索玛花开了，现在，索玛花再度开放。胡明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生活。叶树元、华子军、戴铭等人放弃原来的生活，来到大凉山，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生活。许许多多的援彝人员，在大凉山的艰苦环境中，磨砺出了自己真正的生活。

在创作过程中，胡正荣深入昭觉县扶贫一线，亲身感受到了昭觉县对昭觉县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及援彝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有了这样伙下身子、脚踏实地的文学情怀，才有了今天这样一部集先进性与人本性、现实性与艺术性、思想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作品。

■评论

愈了解，愈敬畏

——王萌萌纪实作品《路上好姑娘》 □于晨

2019年，“全国最美志愿者”王萌萌出版了她的公益旅行札记《路上好姑娘》，“在云南，在路上，六个月，青春正好的十年”，此时距离她完成长篇“志愿者小说三部曲”（《大爱无声》《米九》《爱如晨曦》）已近7年。

从虚构到纪实，从独行到共进，王萌萌的文字一直代表着国内志愿者写志愿者的文学高水准，而在这本小书中，我却感受到某种对“公益写作”的去标签化，代之以献给所有生命的赞歌。

在王萌萌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独属于青春的沸腾热血。譬如《绿色行记》中的《生死大峡谷》一节，王萌萌和友人试图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却因一连串的山体滑坡被困在半途，在随时可能坠落悬崖的进退维谷中，王萌萌“看见滑坡不再有紧张的感觉，快要掉下去时也不再惊慌，累了干脆就倒在滑坡上休息。我那时已经想透了，假如注定要掉下去的话再紧张也没用，不如就放松一点吧。”在情节的紧张和文字的从容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张力，无畏、坦然、感恩，似乎只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便足矣，而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可谓大道至简的朴素信仰。

事实上，行走对王萌萌有着远为特殊的内涵。《在那云雾缭绕处》开篇就写学走路，那是在她支教的云南红河州元阳县黄茅岭乡，走“两侧皆无依傍，看上去如陡然斜插的刀脊一般”的山路，从起初硬着头皮逞强拖累累人，到后来与当地人们一起上山竟能一马当先，其间种种，不足为外人道。而正是这样“爱较劲”的人才有可能坚持十年公益，毁誉不惊。于她而言，“在路上”是方向，也是动力。

王萌萌在后记中写道：“山中好姑娘”写给元阳最让我心疼的姑娘们，她们淳朴、坚韧，却过早地经历不堪与不公，她们渴望美好，用尽全力奔跑，却难以抵达梦想的地方。她们会走错路，但从不失去热望，她们在我心里永远是好姑娘。”这里的好”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优秀不同，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只是做个“女子”，就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一年后，再一次听到关于这个女孩的消息，是她已经被父亲逼迫出嫁。那年她十三岁。”今天，这样的事情依然在阳

光下发生，甚至当志愿者们介入之后，还是不断有女孩辍学，“我无法再怪谁，也一时觉得无法做什么，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王萌萌用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很多不完美的故事，而打动我们的恰恰是那些真实的努力、坚持或者放弃。

值得一提的是，王萌萌与云南当地彝族教师马素英搭档，建立起“一对一物质资助加情感关怀”的长期结对公益助学模式，并非只有物质上单方面的施予，更有精神上双向的交流。王萌萌选择并坚持的这种长期结对模式，事实上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某种程度上无法避免自己与受助方的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她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写作走过的六年，是和小美共同成长的六年。表面看来是我一直在帮助她，实际上她给予我的更多。写作者常与寂寞冷清相伴，小美的坚强乐观和她对我的信赖支持着我克服生活上和写作上的道道难关。”施与受、得与失，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起书中所写的“大地妈妈”易解放，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她放弃辛苦得来的日本工作，回国创建“绿色生命”公益组织，在沙漠中种下数百万棵树。十余年披荆斩棘，王萌萌敏锐地意识到，“她的种树行动进行到如今，早已从当初单纯地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寻找活下去的动力，扩展、升华为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大爱。”这其中，大抵也有某种程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惺惺相惜吧。

一个人的公益是善举，一群人的公益却可以是事业，从青涩到成熟，十余年来，王萌萌她们的公益行动已经先后资助了两百多个云南女孩，其中有些孩子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走上工作岗位，并反哺接力，成为新的公益助学者。这些“好姑娘”是曾经的公益助学对象，是见证昔日的成果，也是现在新的公益助学者，是孕育未来的种子。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作家，王萌萌的文字天然去雕饰，却有一种发乎情至理的真诚，这种“态度上的用心和方式上的恰当”，相较于时下某些浮华的所谓美文，自有一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气。这种风格可能是在10年公益砥砺中不知不觉形成的，面对真实的困境，“做”远比“说”更重要。



书中有一篇“跨界文”《看人生凝结成诗》，曾经连摄像机都端不稳的王萌萌，集编导、拍摄、后期于一身，主创了公益纪录长片《书术梦娘》。她一边拍摄镜头里可供审视剪辑的影像素材，一边以文字记录反思其间的种种摸爬滚打、边学边做，时间不再是连续线性的，事物可以有各种镜像衍生。这种可能连王萌萌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纪录片视角，使其文字自然呈现了大量原生态的丰富细节，不预设立场，不褒贬评判。也正是凭借这样冷静的观察者视角，王萌萌对自身的一场重病进行了审视，甚而审美并沉思：“盛年遭遇危及生命的重疾，或许是我的福报。我不想说苦难令人成长的陈词，更不是说接近死亡一定能让人领悟什么，我只是更能看清并接受自己的弱小、怯懦、虚荣、无明等等弱点，也更珍惜细微的美和善意；少了些急迫，多了些宽容，减了点强硬，添了些通透。”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她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写作者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正如《路上好姑娘》的后记中所述，“这十年的书写使我对于文字有更多理解和敬畏，却也时时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的漩涡，恐怕只有更用力地写下去才可能略微得以缓解。”对王萌萌来说，愈了解，愈敬畏，写作、行走、公益，莫不如此。